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 全国百强社科学报

CN52-5005/C
ISSN 1001-733X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JOURNAL OF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社会科学版
SOCIAL SCIENCE

2002

总第 116 期

GUIZHOU SHIFAN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ISSN 1001-733X



9 771001 733006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
-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 《中国期刊网》全文收录期刊
-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期刊
- 贵州省一级期刊

致 作 者

本刊欢迎作者通过 E-mail 投稿。邮寄稿件请附寄录有稿件文本的软盘。

本刊欢迎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应用价值,含有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的文章,欢迎追踪学术前沿,捕捉争鸣焦点,注意本学科研究热点、难点、基本点及重大课题,或紧密联系国际国内现实,针对性、操作性强的文章。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季刊 1960 年创刊

2002 年第 3 期 (总第 116 期)

JOURNAL OF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Quartered, Started in 1960

2002 No. 3 (May No. 116)

主 办 贵州师范大学
出 版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邮政编码 550001)
主 编 朱健华
副 主 编 汤 跃
电 话 (0851) 6702106 6761863
印 刷 贵阳云岩前益彩印厂
国内发行 贵阳市邮政局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 399 信箱)

Managing Institution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ed by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Postol Service:550001)
Chief Editor Zhu Jianhua
Distributed by China International
Book Trading Corporation
(E-mail:GZSDXB @ sohu.com)

刊号 CN52-5005/C
ISSN 1001-733X

国内代号:66-10
国外代号:C4090A

国内定价:6.00 元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双月刊 2002年第3期(总第116期) 2002年6月10日

● 哲学

- 龚振黔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基础(1)
梁红秀 人类尊严的来源——西方哲学对人的认识思想梳理(4)
曹红,单连春 人与自然的哲学思考(8)
何谋军 透析人地关系思想的演进与生态环境(11)
路言莉 加强生态伦理建设 促进可持续发展(14)
王宇飞 《老子》“道”与“德”是中国古代道德的认识论渊源(17)
-

● 经济·政治

- 史开国 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探析(20)
沈奕斐 现代民主实践与民主理想的背离(25)
杨云鹏 略论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理论与实践(29)
刘晓辉 贵州旅游定位初探(33)
-

● 北太平洋地区论丛

- 杨绍先 日本的战争赔偿与战争认罪(36)
-

● 中亚历史文化研究

- 马骏骐 兀鲁伯简论(42)
-

● 历史学

- 唐景 韩愈历史学说研究(46)
秦文 凌廷堪历史学说综论(50)
易继苍 再探买办兴起的原因(54)
戴银凤 Civilization 与“文明”(58)
-

● 文化 · 文学

- 杨先明 农耕式生存方式与人的奴役——古希腊文化、文学研究之二(62)
涂谢权 论《四库全书总目》文学批评的经世价值取向(65)
李伟昉 论莎士比亚戏剧创作思想的基督教渊源(70)
韩红星 解读贵州蜡染服饰图腾及其传说(73)
李琼英 中国传统文化对三毛散文的影响(76)
-

● 语言学

- 杨同用 时间词的管界与标志(78)
冒国安 同形现象与形式可译(81)
孙芳琴 中西跨文化礼貌用语语用探析(84)
-

● 教育与教学

- 刘旭华,王金霞 教育产业投资中的心理博弈分析(88)
辛治洋 当前我国多元文化教育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思考(94)
刘潇潇 WTO 与高校法律实务型人才培养模式论纲(98)
范向阳 论学习准备与普通话教学质量提高(103)
常江 试论现代教学条件下的班组规模(106)
孙晓萍 论英语教学“一条龙”体系的科学性(109)
孟刚 对体育与健康的理性认识(112)
张梦阳 足球“二过一配合”定义、模式新释(116)
-

● 贵州师大系所简介

教育系(封三)

主管单位:贵州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贵州师范大学

编辑出版: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主 编:朱健华

副主编:汤 跃

通讯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宝山北路 116 号(550001)

电 话:(0851)6702106 6761863

电子信箱:gzsdx@sohu.com

刊 号:CN52-5005/C ISSN 1001-733X

单 价:¥6.00 元

JOURNAL OF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Principal Contents

Gong Zhenqian: On The Phylosophical Basis of The Three Representative Theory(1)

Liang Hongxiu: The Source of Human Beings' Dignity——the Western Philosophy's understand-
ing on Human Beings(4)

Shi Kaiguo: Correctly Reconine Marxist Lalue Theory in the New Era (20)

Shen Yi - fei: Democratic Practice Deviate From Democratic Ideal in Modern Socitey(25)

Yang Shaoxian: Japanese War Reparations and Plead Guilty (36)

Ma Junqi: On Ulugh - beg (42)

Tang Jing: Study on Han Yu's Historical Doctrine (46)

Qin Wen: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Historical Doctrine of Ling Tingkan (50)

Yi Jicang: A Discussion on The Reasons for The Rising of The Chinese Compradors in Modern
Times (54)

Yang Xianming: The Living Method of Agricultural Cultivation and People's Slavery ——The
Culture in Ancient Greece, second research of literature (62)

Tu Xiequan: About the Pragmatism Literature Criticism of Sikuquanshu Zongmu (65)

Yang Tongyong: The Government Boundary and Its Marks Denoting Time in Chinese (78)

Liu Xuhua, *Wang Jinsia*: Investment Game and Education Industry (88)

Xin Zhiyang: On The Problems That Exist In China's Multi - cultural Education Research At
Present (94)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基础

龚振黔

(贵州师范大学教授, 贵州 贵阳 550001)

摘要: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党的建设上的创造性运用,有其深刻的哲学基础。

关键词:江泽民;“三个代表”;哲学基础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02)03-0001-03

On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The Three Representative Theory

GONG Zhen-qian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Professor, Guiyang, Guizhou, 5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three representative theory advanced by Jiang ze-min has a profound philosophical basis. It embodies a creative application of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Key words: Jiang ze-min; The three representative theory;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简称“七一”讲话),对“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他强调:“我们党要继续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胜利前进,归结起来,就是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可以说,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充分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造性运用,有其深刻的哲学基础。科学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基础,对于我们深刻领会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的精神实质,在理论上正确理解“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在实践中自觉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强调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建设这一新的伟大工程中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的生产力理论而得出的一个科学论断。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根本动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它永远不会

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必然引起生产关系发生相应的变革;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变革的客观要求又会导致整个上层建筑的变革,人类社会就是这样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对此,马克思曾作过深刻的论述:“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PP82-83)}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生产力不仅推动着社会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且推动着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思想上层建筑的变革;不仅从根本上决定并制约着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且从根本上决定并制约着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列宁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强调,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揭示社会发展的秘密创立科学的唯物史观,就在于“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3](P9)}承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最终决定因素。

江泽民同志正是从唯物史观这一基本理论出发,深刻揭示了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要求的内涵以及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保持我们党的先进性的内在联系。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1]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的，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哪个阶级、哪个政党或政治组织代表了当时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它就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掌握了领导和推动社会变革进步的主动权。衡量和判断一个政党是否先进以及先进程度如何，最根本的就是看其在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我们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建立时就是以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走上历史舞台的。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改革开放，从根本上讲，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先进性。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敏锐地把握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和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切实的工作步骤，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1]

在“七一”讲话中，江泽民同志还科学地回答了“谁推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他指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我国工人阶级，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我国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同工人阶级紧密团结，是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1]在此，江泽民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的基本原理，充分肯定了我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在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江泽民同志强调：“不断提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以及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始终是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第一要务。”^[1]

江泽民同志还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的作用，把科学技术看成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他认为，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责，就是必须敏锐地把握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趋势，始终注意把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掌握、运用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紧密结合起来，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

总之，强调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揭示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内涵以及与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内在联系，是江泽民同志理论创新

的具体体现，也是江泽民同志对唯物史观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二

强调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体现了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建设领域中对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意识能动作用原理的创造性运用。

既承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又肯定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能动的反作用，这是既唯物又辩证的唯物史观在分析社会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关系问题时所坚持的基本原理。正是基于这一原理，唯物史观认为，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它依赖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同时它又要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服务，对社会的政治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反作用。从性质上看，文化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一般来说，先进的文化应该是科学的、健康向上的、代表未来发展方向、有利于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文化，而落后的文化则是颓废的、消极的、阻碍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文化。从作用上看，只有先进的文化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先进的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也是体现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只有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又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才能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也正是从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意识能动作用这一原理出发，江泽民同志在强调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同时，又指出我们党也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应该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事业；在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因此，“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 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1]江泽民同志的这一论述，体现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意识能动作用的原理，揭示了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内涵，反映了我们党对建设先进文化的高度重视。

坚持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推动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是我们党始终在思想上精神上高举的一面旗帜，也是我们党的先进性的具体体现。建党80年来，我们党努力建设和弘扬反映革命、建设和改革要求的先进文化，不仅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和国外渗透进来的腐朽没落的旧文化，而且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形成了凝聚人心、统一意志的正确指导思想和共同理想。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趋势和要求，坚持以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立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前沿,不断发展健康向上的、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要求,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从思想上精神上正确武装和不断提高起来。这也是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1]

江泽民同志还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本任务、重要方针、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等作了全面的阐述。他认为,发展先进文化的根本任务,就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方针,就是唱响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旋律,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就是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江泽民同志还强调,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感召力”,从而“把亿万人民紧紧吸引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伟大旗帜下”。^[1]

总之,江泽民同志把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意识能动作用的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党的建设,强调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并深刻揭示了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科学内涵,从而充分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和理论创新的精神。

三

强调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把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既作为“三个代表”的落脚点,也作为党的建设和党的各项工作的落脚点,是江泽民同志把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党的建设而得出的科学论断。

群众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也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对立的基本标志。在唯物史观看来,人类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的发展进步是人民群众通过其伟大的创造活动推动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4](P1031)依据唯物史观这一基本原理,形成了我们党的“坚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的群众观点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能否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关系到能否彻底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大问题。

正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江泽民同志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

区别。因此他强调:“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1]可以说,在“三个代表”中,这一“代表”具有最根本的意义,因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和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建设、党的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的根本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

我们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建党80多年来,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说到底就是要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去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我们党发扬不怕牺牲、前仆后继、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革命精神,艰苦奋斗、勤奋工作,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我们党赢得人民群众拥护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原因。为此,江泽民同志要求“全党同志要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的根本观点,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使各项决策和工作符合实际和群众要求”,^[1]在任何时候都做到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我们党的先进性。

总之,江泽民同志系统阐述了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科学内涵,充分肯定了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三个代表”中的重要意义,深刻揭示了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党的建设、党的各项工作和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内在联系,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进一步发扬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参考文献:

- [1] 江泽民.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 人民日报, 2001-07-02.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3] 列宁选集[M],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4] 毛泽东选集[M],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责任编辑 汤跃

人类尊严的来源

——西方哲学对人的认识思想梳理

梁红秀

(广西大学社会科学与管理学院 科技伦理学硕士研究生, 广西南宁 530004)

摘要:西方哲学中一直都包含着对人的认识这一内容。从人生哲学、宗教人学、到理性主义人学及现代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和反思,西方哲学对人的认识逐渐深刻。而这种认识最后必然得出结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共存,人在与自然的和平共处的实践中实现价值。

关键词:人生哲学;宗教人学;理性;人类中心主义

中图分类号:B51-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02)03-0004-04

The Source of Human Beings' Dignity

——the Western Philosophy's understanding on Human Beings

LIANG Hong-xiu

(Dept. of soci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Guangxi University, Nanlin, Guangxi, 530004, China)

Abstract: The western philosophy contains the understanding on human beings and the understanding is deep gradually from philosophy of life, religious philosophy to rationalist philosophy and the criticizing and thinking of doctrine with the center of human beings. We can make a logical conclusion, that is, human beings are one part of the nature. Peacefully co-existing with the nature, human beings realize their values in the activities.

Key words: philosophy of life; religious philosophy; rationalist philosophy; doctrine with the center of human beings

卡西尔在其名著《人论》中明确指出:“从人类意识最初萌芽之时起,我们就发现一种对生活的内向观察伴随并补充着那种外向观察。人类的文化越往后发展,这种内向观察就变得越发显著。”^{[1](P87)}其中外向观察指人类对自身外部世界的认识,而内向观察则指人类的自我认识。卡西尔甚至认为,认识自我才是哲学研究的最高目标。且不论这种看法是否正确,考察西方哲学,不难发现,无论是古希腊的本体论哲学,还是中世纪的宗教人学,以及近代的理性主义人学、现代哲学界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和反思,无不彰显出人类自我认识的努力。一部西方传统哲学史,也就是一部人类关注自身、认识自我的历史。

一、古希腊从自然哲学到人生哲学的演化

古希腊哲学诞生于城邦制的奴隶社会。泰勒斯从源于原始社会的自然宗教观点出发,开始寻找诸多自然物的统一的本质和始基,标志着古希腊自然哲学的诞生,它也是西方传统哲学的开端。从本质上来说,古希腊自然哲学是一种本体论的哲学。它关注对象世界而疏于反思自我,执着于寻索万物的始基和本原而尚未自觉地把自我看成是对象世界的凝视者,更未意识到客观世界只是相对于自我的主观呈现。“古希腊的世界观不是取向于历史,而是取向于宇宙,……古希腊中甚至没有表示个人、意志和良心这些现象的词,……从发源上来讲,古希腊文化确实象其它古朴文化一样,是无人称和无心理性的。”^{[2](PP94-95)}然而,这种外向地寻求一种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的始基和本体的自然哲学,已经表现出了一种思维主体的能动性和抽象性。而且这种外向的寻求乃是不自觉的基于一种内在于人性中的对于普遍性的渴望(维特根斯坦),基于人性对确定性的追求(胡塞尔),基于自我意识对于一般性的欲望(黑

格尔)。从另一角度而言,始基与万物之间具有不可更改的“血缘亲子”的关系,人作为始基的创造物之一,也与始基具有合一性。这实质上暗含着始基和宇宙本原的性质决定了人的属性的思想,是一种对人的间接关注。

到普罗泰戈拉,已经直接把人作为哲学的关注点。“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3](P27)}这一名言表明个人自我意识已从外部必然性和神的意志中分化独立出来,体现了个人意识的觉醒。德谟克利特的“人是一个小世界”^{[4](P107)}的提法把个人作为自在的、独立的、有意识的原子来理解,为后来西方的个体主义和民主政治奠定了最早的理论基础。苏格拉底明确将“认识你自己”作为哲学探究的根本任务,真正地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从外部自然拉回到内心世界,使哲学的目光从对本原、客体问题的探讨转向对人和道德问题的研究,从而奠定了人生哲学的基础和框架。“从苏格拉底开始,人真正作为人而成为探讨的主题”,^{[5](P165)}苏格拉底之后的所有哲学家都无一例外地把对人自身的认识纳入自己的哲学体系。其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以不同形式提出了人的社会性思想。人的理性、情感、欲望、伦理道德、人生意义等问题已成为人类自我认识的重要内容。

当然,人生哲学虽然强调了人的理性,看到了人的社会性,但它的人却不是指单个的个体,而是指整体的人类,因而它对人的关注呈现出一种相对朴素、相对粗糙的色彩。

二、中世纪宗教人学中人的神化

通常认为,在中世纪,哲学沦为神学的婢女。所有的哲学思想,都是为了论证神学教义的合理性与上帝的伟大。宗教神学的基本观点是:“至高、至美、至能、无所不能、至仁、至义、至隐、无往而不在、至坚、至定”、“负荷一切、充裕一切、维护一切、创造一切、养育一切、改进一切”^{[6](P5)}的上帝是世界的主人,它创造了世界上的一切,包括人。人在上帝面前负有原罪,人在今生的任务就是信仰上帝、依靠教会、多做善功以赎回自己的罪过,来世获得拯救。在这一黑暗的时期,神学统治了全部意识形态,人对自己地位的认识全面倒退了。在上帝主宰一切的世界里,人失去了自身,失去了与自然的天然关系,沦为上帝的仆役和解释者。

但是,“一切宗教的内容是以人为本源”,^{[7](P177)}宗教神学正表现了对人的生存境况的深切关注。基督教以颠倒虚幻的神学语言反映了对人的问题的焦虑与关切,对人是什么、从何处来、往何处去、人的意义和价值何在等形而上学问题作了形而上学方式的阐述。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神学是最深刻的人学。^[8]中世纪基督教哲学是神化了的人学。

按基督教经典《圣经》的说法,人源于神,由上帝所造。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亚当和夏娃,这一男一女即是人类的祖先。这里包含的意思可理解为:上帝与人具有同一形象,上帝和人具有同样的感情,只不过上帝比一般人的性质更完善、力量更强大而已。而且,当上帝因人间的丑恶而毁灭地球时,还与一个叫诺亚的凡人订立契约,赋予他统治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一切生物的权力。这就是说,人相对于其他生物来说,实质上拥有上帝的性质和能力。纵然这权力可能被剥夺,但人获得拯救之后仍可归于上帝。可见,宗教教义及其神学家的解释,虽然在人与上帝之间划下了一道鸿沟,但从一开始并没有完全杜绝人与上帝的沟通。“上帝的人格性,本身不外是人之被异化了的、被对象化了的人格性”,^{[9](P267)}上帝其实就是神化了的、对象化了的人。不是上帝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而是人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无限的或属神的本质,就是人的精神本质,但是,这个精神本质被从人里面分离出来,被表象成为一个独立的存在者”,^{[9](P327)}理想化了的人格就是上帝。

因此,全部基督教神学实质上是关于人类的学说。它虚构了一幅人类起源、堕落、犯罪、赎罪、获救的奇特画面,指出了一条人类否定自身、超脱尘世、走向天国、皈依上帝的艰难路程。它反映了人类对自身以及生存困境的迷惑,是对现实和苦难的抗议,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表现了无力摆脱苦难的人们的追求与渴望。同时须指出的是,在中世纪,神学家们为论证其神学体系,十分提倡理性思维,不仅为近代实验思潮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而且为其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三、从文艺复兴“人的发现”到近代理性的张扬及自我的困境

经过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文艺复兴不仅复兴了各种文艺,而且发现了人。通过对天国价值的怀

疑,对僧侣集团的嘲弄,对人的高贵、完美和万能的颂扬,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站在时代的高度,将古希腊时期关于人类自身的理性认识纳入到新的关于现实人的思想体系中。他们发现了人类在宇宙中的主体地位及其价值,发现了拥有能力和自由的个体及其丰富的主体个性,发现了人的自然欲望的现实合理性,发现了人的理性的至上性,并在实践中造就了真正的多才多艺、学识渊博和具有冒险精神的人。“人的高贵,就其许许多多的成果而言,超过了天使的高度”^{[10](P66)}“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性是多么高贵!论行动,多么像天使!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11](P63)},富有鼓动性的诗篇和口号,宣告人的本性、人的价值成为一切哲学思想的中心议题。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启了西方工业文明时代人本精神和科学理性精神的大门。

近代西方哲学充满了理性主义精神。18世纪启蒙思想家在反封建过程中,就注重树立理性的权威,用理性来审判一切。笛卡尔宣布“我思故我在”,从理论上确立了人的理性相对于万物的优先地位。理性是自我的思想活动,自我要把握真理就必须怀疑一切,在普遍的怀疑中寻找不可怀疑的东西,“自我在怀疑”本身正是不可怀疑的。因此,“我思”就成为笛卡尔哲学的起点和基础,成为确定性真理的最后依据。这是对理性精神的极大张扬。它歌颂了人的主体逻辑思维的理性精神,确认理性是衡量一切的尺度,人的本质就是理性。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宣告人可以凭借自己的理智在强大的自然力前得以自立,可以在自身中找到在宇宙中独立自强的力量。洛克对人的理解力进行了全面的探索,论证了人能够认识世界,指出只有经过人的理智认可的传统观念才是值得信赖的观念。而其他近代哲学家如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休谟等的思想中也显示出他们对理性的张扬。德国古典哲学是启蒙思想在哲学理论上的高度概括和进一步发展,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过程,就是在哲学中彻底贯彻理性原则,建构庞大的理性哲学体系的过程。

然而,作为理性的起点和终点,“自我”这一概念本身包含严重的问题,暴露出理性内在的困境和危机。笛卡尔及其后继者们以自我的确定性为基础,将事物作为眼前的现象来把握,并将这种把握置于完全的确定性中,从而使自由的人的主体性扩张为意欲意志,要求完全支配世界。这其中,包含有三个谬误。首先,世界上并不只有我存在,还有他者。他者相对于我而言是无限的。他者的无限性包围着我,把我送进此在。这个无限的他者实质上就是存在神学中的上帝。他者占有最高原理的位置,则曾经占有这个位置的自我就被赶走了。我思只是表面上的,完全是一种暂时的先在,只是为了展开思路的需要。不求助于上帝的真实性,我思自我幽闭式的明证本身仍是封闭的,无法确定世界的实在性。其次,自我缺乏人格,即“不同时间中我的同一性意识”。我思,我在,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无疑能多久?如果我作为自我只是思维的存在物,那么它的确定性与思维的意识是一样的,每当我说“我存在”或在思想中领会这句话,我思的真理性就被确定了,但我一停止思我,我就不再意识到我和我存在。而生命的时间本质上是不连续的。因此,我绝对的确定性只是存在于瞬间的闪现中,转瞬即逝。则我就只是一个断断续续的片刻。第三,康德的先验的我虽然克服了时间性问题,但它只是一种绝对精神。它是“(意识的)纯粹形式”,“一个内容完全空洞的表达式——我”。^{[12](P355)}我思形式的抽象只表达了一个重言式句子:“我=我”。它的谓语也只是分析(而不是综合判断),只阐述这个抽象同一性之逻辑涵义,却不让我们认识实在的事物。如果我思只是一个空洞的形式,它就不可能彻底与它给予形式的东西分离,因此,坚持非时间性的先验意识和处于时间中经验意识间的本质区别是不可能的。

总而言之,自我的困境表现在,自我要给自己奠定一个确实可靠的基础,但其可靠性却一直动摇不定,它无法不逸出自己去寻找自己外在的可靠性根据。从笛卡尔、洛克、休谟到康德、黑格尔,都在为自我寻找根据,但却都没有找到一个可靠的根据。形而上学的主体是纯粹理性的幻相。这种纯粹理性剥夺了主体的时间性,以保证主体的无限性。但人必然要在存在中,即在时间中理解自己。时间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只有在存在中,而不是在意识中,人才能真正把握自己。剥夺人的时间性实质上就是在消灭人。正因为近代自我的困境,才使人类理性的发展最终无法避免人类对自然的无节制的征服的非理性行为。

四、现代人文精神和总体性危机及其反思

现代人文精神是在近代理性主义实践形成的物质文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近代理性的张扬使人类

不再怀有对上帝一类的终极实体的追求和敬畏,只要他肯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每个人就是他自己的上帝。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确实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保证了人的欲望的满足。于是在公众心目中,科技是万能的,理性是万能的,人们认为凭借理性、凭借科技在征服自然之役中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纵然遭受挫折,也不放下征服之剑。

这一套信念可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功利主义伦理学。其中功利主义伦理学也是为人类中心主义服务的。它认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要无条件地服务于人类,听任人类自由意志的摆布。这是主客二分之后人的主体性张扬的结果。海德格尔认为,一切存在者不是客体就是主体,究竟是什么都视那个自我意识的主体而定。^{[13](P119)}主客体的分离已覆盖宇宙间的一切,而只有有意识的人才是主体,其他一切皆为客体。主体就是处于主体地位的东西,主体性即主动性、创造性、能动性。在科技时代,主体即自然过程的控制者、操纵者、复制者。人之外的一切皆可由人控制、操纵、复制。在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图景中,人类作为唯一的主体而成为宇宙万物绕之旋转的中心。

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曾引导人们在改造自然、控制自然方面取得空前的成功。然而到20世纪末,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性已暴露得越来越明显。问题就集中于它所鼓励的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态度,以及相应的征服行为所导致的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生态平衡的破坏。人类中心主义一方面将人置于上帝的位置上,把自己定为最高级位的存在,另一方面又不具备上帝的超然性,而仅仅从人类自身的角度考虑问题,担负不起对整个世界负责的重担。从而引发了现代人文精神的总体性危机。

对这种危机进行反思,是当代哲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呼吁“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者有之,捍卫人类中心主义的也很多,还有学者提出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这表明理论界已认识到对人的认识不能仅限于人与人之间,更应在人与自然的和平共处的前提下重新评估人的价值。

笔者认为:人类中心主义之所以会在取得丰富的物质成果的同时造成巨大的灾难,源于它采取一种主客对立的模式去定位人与自然关系,从而严重局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解释。在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人类中心主义有两个先在的假定:第一,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过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且从根本上说是对立的关系。其中,主体是自为的,是价值的当然承担者,而客体则是主体所设定的,是“他者”,本身谈不上价值。第二,自然是无限的,而且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天敌,是恶的无限,不存在内在的伦理意义,也不存在人对自然的伦理意义。事实上,人与自然不可以完全归结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归结为认识论模式之下的主客对立。人是理性的,同时又是非理性的,人与自然拥有共同的生活基础。自然是与人类生存在原则上具有同等生存意义的另一个主体。也就是说,人在上帝面前的卑微与在自然面前的强大同样是虚幻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的创造物,是上帝的缔造者。人依赖自然界进行劳动创造了生活,正是与自然共存的生活赋予人以价值。

参考文献:

- [1] 卡西尔. 人论[M]. 甘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 [2] 科恩. 自我论[M]. 佟景韩等,译. 上海:三联书店,1986.
- [3] 周辅成. 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M],上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4.
- [4]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 古希腊罗马哲学[M]. 上海:三联书店,1957.
- [5] 胡塞尔. 现象学与哲学的危机[M]. 吕祥,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 [6] 奥古斯丁. 忏悔录[M]. 周士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7] 马克思,恩格斯. 论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8] 雷红霞. 西欧中世纪人学思想初探[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6).
- [9] 荣震华,译.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M],下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10] 周辅成. 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言论选辑[J].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
- [11]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全集[M],第七卷. 朱生豪,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 [12]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M]. 韦卓民,译.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 [13] 张汝伦. 海德格尔与现代哲学[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 汤 跃

人与自然的哲学思考

曹红,单连春

(贵州师范大学政治经济系 硕士研究生, 贵州 贵阳 550001)

摘要: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环境的恶化现实地摆在人类的面前。人与环境的关系为什么会这样?本文从哲学的角度,阐述了作为主体的人的活动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从而使人们自觉地规范主体行为,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主体; 客体; 和谐; 变异

中图分类号:B-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02)03-0008-03

Philosophical Thinking Between Mankind and Environment

CAO Hong, SHAN Lian - chun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

Abstract: With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politic, economy and culture, the deterioration of environment takes on human beings realistically. What does lead to this problem?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different consequence that derives from the action of mankind from philosophical view. In order that human beings model themselves upon the law and pledge the accordant between mankind and environment.

Key words: subject; object; accordant; variance

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发展,一直是人类所追求的理想目标,但现实生活中却经常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困境,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和谐困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和人的意愿相违背的结果呢?本文试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加以思考,力求找到解决问题的合理方法。

一、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关系

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关系根源于主客体的关系。人类主体活动的最高目标在于求得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而要取得这种成果,必须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作用,实现思维和存在合理的相互转化才能得以实现。因此,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是一种主体和客体之间能动的双向性“对象化”活动,即“人造就环境和环境造就人。”这种相互造就,就其本质而言是在实践基础上的“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向过程。

所谓“主体客体化”就是主体通过能动而现实的实践活动,对客体积极作用、影响和改造,把自己的本质力量能动地渗入、融合到客体之中,便使客体成为一种属人的存在,成为主体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主体的“化身和投影”,也就是人造就环境。经过主体的客体化以后,自然与社会环境就打上主体的烙印,这时主体可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认识自身和实现自身。人类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虽然没有使自然资源本身发生变化,但在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的程度、范围和方式上已经打下了主体的印记和意图。这时的自然环境已经从“自在之物”成为“人化之物”,同时主体通过自觉能动的活动,能够创造出自然界根本没有的新产品、新对象,这些新产品、新对象的存在本身,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和确认。

所谓“客体主体化”就是指作为同实践主体相对应、并和主体发生着现实相互作用的实践客体,通

过各种途径和形式使主体在活动场所中不断得到满足、丰富和提高,使客体的某些特性转化为主体的特性,从而使主体成为整个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环境影响、造就人的过程。主体是活的、开放着的有机体,来自自然界,离不开自然界,总是通过与周围对象世界的各种交换完成新陈代谢过程,因而客体在满足主体需要之时,又为主体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也使主体自身得到丰富和提高。

但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两者是同时发生的。例如,主体需要客体化的同时就是客体效用的主体化,只有把主体需要与客体效用相统一起来,双方才能相互沟通、相互统一;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水平的提高的同时也就是客体为主体所掌握。因此,“人与环境”正是通过这种主客体双向对象化的过程而相互作用、影响,联为一体的。

人与自然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表现为两种存在状态:“和谐”与“异化”。人作为一种对象性的存在,一来到世上,就同周围的环境存在着一种不可避免的、必定如此的、自在的、确定的关系,但人可以发挥主体的意识能动性,自觉地意识到这种关系,从而在头脑中观念地建构和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最终通过实践活动,把观念性的主客体关系转化为现实活动中的主客体关系。因此人类社会出现以前,大千世界走自己的路,自生自灭。这种环境我们称之为“自在世界”。即使现在,宇宙中还有很多自在世界不为人们所知,还待人类将来去认识。人类社会形成以后,逐渐形成了一个被人类所创造的对象世界——“人化世界”。一方面,它以自在世界为前提,在自在世界的既定基础上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它又以人的自觉活动为形成条件,没有人的需求、利益作用于自在世界,自在世界也无从向人化世界转化。因此,“人化世界”是人类在历史实践活动中生成和创造的,是主体与客体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

二、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两种存在状态

客观上来说,这些结果的产生,作为主体的“人的思维能动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物质世界有自身的发展规律。自然界有自然界发展的规律性,人类社会也有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要改造物质世界,主体必须认识和能动地作用于客观规律,如对这些规律一无所知或一知半解,都不能达到对它的支配,改造自然就成为一句空话。正是人类思维的概括性和抽象性以及历代的实践活动,使人类能深入客观世界本质,把握其规律为人类造福。其次,人化世界的形成除必须认识和支配客观规律外,还具有理想的蓝图,也即主体活动的计划性和目的性,而且在实践活动中不断地修订计划和蓝图。所以,“人化世界”往往是主体和客体长期矛盾运动转化的结果。面对新世纪,为了创造更美好的人与环境的和谐关系,作为主体的人类应更加自觉地认识自然发展的规律,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为人与环境和谐关系的实现而努力。

人类实践的最终目标即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为此,当今世界各国为了切实保护环境,保障可持续发展,纷纷制定一系列文件法规,以保护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就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而言,主体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客体在满足主体要求的同时又促进自身的发展。它体现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

异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在马克思看来,异化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既不是从来就有,也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所谓异化,是指主体的创造物与主体相脱离和相对立,甚至反过来成为反对主体、奴役主体的工具,主体同其创造物之间存在着一种敌对的、异己的关系,它是对象化的一种变态。面对一系列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这不仅增加和丰富了人们的各种知识,提高了人们实践活动的能力,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引起了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空前革命。但是人们在享受文明成果时,又伴随着从来没有过的难题,这就是人与环境关系的恶化。因此,异化现象与人化世界同步存在,形成人化世界的同时产生了异化现象。

人化自然环境中的异化现象主要表现为:违背自然规律的改造所造成的对人类的惩罚性的结果。如:大面积地开荒造成大量的森林、草场被毁,造成水土流失、耕地退化或减少;改造自然的活动中所产的“副作用”日积月累,造成全球大气变暖,灾害性气候增加等。

这些异化现象产生的原因就在于实践主体——人的本质力量和实践能力的局限性。当然,人的实践能力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因而,有什么样的实践主体就会有什么样的实践结果和实践效应。因而

主体如果在从事实践活动之前能深思熟虑,周密计划,采取积极的措施把各种异化现象缩小到最低限度,那么就不会导致今天人与环境的“和谐困境”。因而解决这一困境的根本方法就是既要尊重客观规律,又要重视提高人自身的本质力量 and 实践能力。做到主体和客体与思维和存在的辩证统一,不能只强调一方而忽视另一方。只有这样克服当前的困境才是可能的。

三、人与环境关系发展的前景

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使人与环境的关系更和谐、更有序,还是更对立、更恶化?文明的发展是导致人类与环境的和谐共处,还是共同毁灭?对这些发展前景的认识,采取盲目乐观和消极悲观的态度和想法都是错误的。无视人类活动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及长远后果,一味地醉心于对环境改造的“胜利”,以为明天会更美好的盲目乐观是没有根据和十分危险的。其实作为主体的人类并不是不认识其改造的结果,而是这种结果往往会给他带来眼前的经济利益和短期的社会效益,因而就漠视了“改造”带来的负面效应。因此,对于当代人来说,要认真审视和约束自己的行为,增强意识和紧迫感,珍惜和发展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要正确处理好短期效益与长期发展的辩证关系;同时也不要被严峻的形势所吓倒,进而产生消极悲观的想法和态度也是十分有害的。

首先,要树立人与自然的整体观念。重视人与自然的整体性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传统观念。老子在《道德经》里就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人是自然的产物和组成部分,自然是人赖以生存的环境,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利益息息相关。第二,要树立超前意识。所谓超前意识,指的是人们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出发,对自身当前和未来活动及其结果的提前认识。避免过去先污染后治理的落后理念,重视环境的保护和培育,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思维,坚持建设与保护并重,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减少过去那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近视行为,转变边建设边破坏的局面。第三,要树立持续发展观。要使自然成为适宜于人类和其它生物生存、发展的一个持续、永存的环境,必须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人类活动其中的自然视为外在社会的、不变的形而上学实体。可持续发展倡导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将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相和谐,将“人的自然”与“未人化自然”相和谐,从而保持资源质量和持续供应能力前提下经济的持续发展,在不超载环境系统涵容能力和更新能力的前提下的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第四,要树立平等发展观念。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一种等向的对象性活动,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并不意味着人这个主体掌握自然的控制权。自然作为与人相对的客体,只是人认识和改造的实践对象,人与自然的转化活动,即以思维与存在的相互转化为核心的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是互利性的活动,人与自然是对等的对立面,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需要改变人高高在上的思维模式,正确对待自然的独立平等地位。

总之,人与环境的关系,既依赖于自然界这个客体,又依赖于人自身这个主体。但总的来说,人与环境关系发展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人类自身,取决于人类自身有理智的活动,取决于辩证地看待主客体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矛盾统一。

参考文献:

- [1] 蔡成效. 哲理新探——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沉思[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9.
- [2] 齐振海, 袁贵仁. 哲学中的主体和客体问题[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 [3] 贺善侃, 黄德良. 哲学与社会[M].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4.
- [4] 欧阳康, 等. 世纪之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

责任编辑 汤 跃

透析人地关系思想的演进与生态环境

何谋军

(贵州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系 硕士研究生, 贵州 贵阳 550001)

摘要:文章从历史的审视中,总结了各个时期的人地关系思想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从中提出未来人地关系应是协调共生的关系,并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思想。

关键词:人地关系思想;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思想

中图分类号:X17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02)03-0011-03

Pesp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geography Relationship Thoughts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E Mou-jun

(Department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of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Postgraduate, Guizhou, Guiyang, 55000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generalizes the thought of human-geography relationship which existed in different time, including the influence 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t also points out the future human-geography relationship should be coordinative intergrowth relationship. And it gives the environmental ethic thoughts which i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e thoughts of human-geography relationship;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ethics thoughts

美国生态哲学家利奥波德在《沙乡的沉思》中这样写道:“一声深沉的骄傲的嗥叫,从一个山崖回响到另一个山崖,荡漾在山谷中,渐渐地消失在漆黑的夜色中。这是一种不驯服的、对抗性的悲哀和对世界上的一切苦难的蔑视情感的迸发。”^{[1](P1)}这是他从那只垂死的老狼的嗥叫中所感到的一种忧虑,一种对世界的忧虑,也是站在狼这类动物的对立面的人的忧虑。他的忧虑是出自他和自然建立起来的关系和感情,对生命、对人和自然界一切生命的热爱。^{[2](P140)}而这种忧虑与我们当今全球的生态危机又是如此惊人地吻合。人口的激增、水资源危机、大气严重的污染、生态平衡的失调、频繁的自然灾害等问题的出现,无一不给具有智慧力量的宇宙中最高级生命形态“万物之灵”——人类敲响了警钟。在人类与生存环境所构成的人类生存系统中,人与地(地理环境或自然界)的关系构成了该系统的主体。而从其历史的演绎中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人地关系思想,在不同人地关系的影响下,其生态环境状况亦是不同。

一、依赖者的无奈——原始的人地协调观

距今1万年左右,出现了原始的农业生态系统,这是人类生存史上最光辉的篇章。然而这些均是非理性的偶然灵感的反应,对于立足未知世界只能被动地适应自然。正是由于对自然界的无知,生存的艰难和灾难疾病带来的痛苦和压力,产生了自然崇拜和自然拜物主义思想。这一时期的人地关系思想表现为“天命论”、“地理环境决定论”及我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论”等。

天命论用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来解释自然的运动规律及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原始先民们。在风雨雷电,山崩地裂,洪水猛兽自然现象面前软弱无力。对太阳的崇拜,对各种动物的崇拜等等,表现人类对自然的敬畏、退让、希冀与乞求的意识,表现出主动的协调行为。天命论的人地观是人类在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依附和屈从于自然界这种人自然关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应。

地理环境决定论者则主张地理环境影响着人的体格、气质和精神。亚里士多德、希罗多德、希波克拉底都是环境决定论者的代表。早期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者还仅限于地理环境对人的生理、性格和气质的决定作用,而后来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者推而广之去解释人类社会及其发展。德国的地理学家拉采尔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其活动发展和分布与生物一样受环境的限制,环境“以盲目的残酷性统治着人类的命运”。

而“天人合一论”则是我国古代人地关系思想的典型代表,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伦理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及文学家的共同创造。在《周易》中有明确的天人协调思想。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在孟子看来,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人的品行是天所赋予。这种天与人性、内心的统一,要求人以道德规范约束自己,以求接近与天和谐的境界。

以上的三种人地关系思想,均强调了自然环境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天人合一论”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实质是一种原始的人地协调观,是一种原始的环境伦理思想。在当时,人对自然环境的作用只停留在自然环境有序运转的规律作用范围里,对自然环境的某种侵害和破坏,自然环境能够在短时间内进行自我组织调控修复。人类利用的自然资源基本上是可更新的自然资源,利用量少。人类活动能力的有限,就决定人类只能以生活活动和自己的生理代谢过程与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这时人类同环境之间的矛盾不突出,人们努力的目标仅是适应环境利用环境而很少有意识地改造环境,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很少。从古代文明发源地——古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印度文明以及我国黄河文明不难看出当时的生态环境状况——“茂密的森林,碧绿的草地,富饶的田畴,宜人的环境,遍地流淌着牛奶和蜂蜜……”,一幅多么和谐的令人向往的自然景观图!

二、农业社会——同时奏响的田园丰收曲与咏叹调

当人类有意识把种子撒向土地时,人类文明便进了一步,大约在五千年前,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古埃及、古印度以及中华文明相继出现。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工具和农业技术不断进步,人类向农业生态系统不断输入物质和能量,保证了农业生产的稳定性,从而使人类生活条件有了基本的保证,为人类的迅速繁衍提供了条件。人口从2000万猛增到18

世纪的8亿。人口迅速增长迫使人们加大对农业自然资源开发的广度和深度,在广阔田园奏响一首丰收曲时,一些不和谐的“咏叹调”也夹杂其中。这一时期的人地关系思想主要表现为“或然论”。

“或然论”是随着地理环境论受到广泛抵制、测不准原理的提出以及概率论形成而出现的一种人地观。法国地理学家维达尔·白兰士认为,“自然为人类的居住规定了界限并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人们对这些条件的反应和适应则根据他们的传统和生活方式而不同。人类生活方式不完全是环境统治的产物,而是各种因素复合体。同样的环境可以产生不同的生活方式。环境包含许多可能性,对它们的利用完全取决于人类的选择能力”。维达尔的学生让·白吕纳进一步指出“自然是固定的,人文是无定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常随时代而变化”。法国历史学家费弗尔称这种理论为“或然论”,并表达为“世界并无必然,到处都存在着或然,人类作为机遇的主人,正是利用机遇的评判员”。^{[4](P20)}我国唐代诗人、思想家刘禹锡提出的“天与人交相胜”的观点也可以归入“或然论”的范畴。他在《天论》中说:“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认为天的职能在于生长养育万物,而人的职能在于治理万物。天与人的职能不同,所以“天人交相胜”,天可以胜人,人可以胜天。“或然论”作为农业社会时期的人地观主流,仍未摆脱把人地关系看成因果链的怪圈。人作为自然的对抗者在这一时期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却又如此令人心痛疾首!

印度河——恒河流域丰饶的平原地区,被人们称为是大自然对印度民族的慷慨馈赠,她哺育滋养了悠远的印度文明。然而由于人们对大自然无休止的索取,森林遭到破坏,水灾、水土流失和土地盐渍化十分严重,导致这个处于热带地区的文明古国生态系统极其脆弱。

孕育了中华文明的黄土高原,如今已是一片瘦骨嶙峋、黄沙肆虐、干涸贫瘠、千沟万壑的疆土。正是由于人们的过度采伐和开垦,使得原先的林茂草丰之地变得荒凉一片。

今日的不毛之地撒哈拉沙漠也曾经是河川涌动、草树繁茂、动物成群的生命绿洲。正是由于大片森林被砍伐大片植被被烧毁而导致了沙漠的形成。

希伯来人创造了上帝,而上帝也没能拯救希伯来文明的没落。曾经长满了小麦、大麦、葡萄、无花果和石榴树,到处有橄榄油和蜂蜜的土地,如今已多半沦为不毛之地,土壤侵蚀达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

在希腊,这片曾经丰饶富裕而孕育过瑰丽多姿的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的土地现在只剩一副病